



## 吴挺归蜀与南宋中期四川的边备调整\*

陈希丰

**摘要:**淳熙元年(1174年),在孝宗践履恢复的战略规划下,吴氏家族第二代领军人物吴挺回归四川,出任兴州都统制。此后数年间,针对蜀口防务,宋廷集中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孝宗一方面为吴挺建节、废罢四川宣抚司、予其军中人事与财权、令兼利州西路安抚使,示以极大的倚信,“放权”意味明显;另一方面,关外四州守臣的文官化、兴州屯驻大军建制改革、凤州防务划归兴元都统司等边备措置,又都或隐或显体现出防范吴挺的意味。这些紧密围绕于同一时间节点又明显自相矛盾的举措,深刻反映出南宋君主对于吴氏世将“既用且防”的矛盾心态,并对南宋后期蜀口防御体系的边防效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南宋;吴挺;四川战区;边防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6-0081-10

**DOI:**10.16600/j.cnki.41-1426/c.2024.06.010

南宋王朝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诞生于错综纷乱的战火与危难中,并长期处于北方民族政权的军事强压之下的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sup>①</sup>。在这一基本立国背景下,依托江淮、京湖、四川三大战区(宋人称为“三边”)为核心的边防体系,南宋与金、蒙(元)北方民族政权持续对抗达一百五十余年之久。

四川作为南宋“三边”之一,其边防与军政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并已有丰硕的成果。大致以21世纪初为界,有关南宋四川边防军政的研究,在范式上经历了由关注战争过程、武将家族兴衰、重要人物述评到探索战区军政体制运行、各权力主体关系的转变<sup>②</sup>。新的研究范式,在时段上特别重视南宋前期<sup>③</sup>。这既是因为该时期军政形势异常复杂,也与相关文献较为丰富、集中有关。与之相比,囿于史料的细碎、零散以及缺乏体系,加上长期处于非战状态,有关南宋中期四川边防军政的研究明显薄弱。以

往研究主要侧重分析吴氏武将第二代掌门人吴挺与四川制置使胡元质、丘密,四川总领李繁等文臣军政大员间的矛盾与斗争,以此检视南宋中央治蜀策略及“以文驭武”祖宗家法的实施<sup>④</sup>。

实际上,南宋三大边区——四川、京湖、江淮,各有其自身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若我们适当转换视角,从南宋四川边防格局演变的角度切入,则会注意到:以淳熙元年(1174年)吴挺回归蜀口、掌领四川边防主力军——兴州屯驻大军为时间节点,宋廷针对蜀口防务集中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有的旨在增强蜀口防御体系的效能,有的暗含了对吴挺的防范,且皆对南宋后期四川边防与宋金、宋蒙战争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前人措意不多<sup>⑤</sup>。本文拟以《宋会要辑稿》、碑刻墓志及宋人文集为主要材料依托,从兴州屯驻大军的建制与驻防调整、凤州防务归属权的变更、蜀口关外四州守臣身份的转变三个层面考察南宋中期四川战区的边备调整及

收稿日期:2024-07-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南宋边防格局的形成与演变研究”(19XZS007)、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研究计划“传统中国的战争与公共财政,第一阶段,宋元时期”(13604222)。

作者简介:陈希丰,男,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00),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其影响,并探析朝廷对于吴氏武将的复杂心态。

## 一、吴挺归蜀与孝宗的倚重

南宋初年,蜀口守将吴玠、吴玠兄弟率军抗击金兵,保固川蜀,功勋卓著。绍兴和议后,吴玠以兴州都统制、利州西路安抚使的身份,掌领四川战区主力部队——兴州屯驻大军长达二十余年,被誉为“国之长城”<sup>⑥</sup>。吴挺系吴玠第五子,也是吴玠亲定的接班人。在高宗末年的宋金“辛巳之役”中,吴挺以兴州都统司中军统制率师北上陇右,表现突出。乾道三年(1167年),吴玠病逝。孝宗出于抑制吴氏世将的考虑,反对由吴挺接掌兴州屯驻大军<sup>⑦</sup>。吴挺先是调任金州都统制,随后持服守丧,紧接着又于乾道六年(1170年)被召入朝,授左卫上将军之虚职,脱离四川。

然而短短四年后的淳熙元年,吴挺竟得回归蜀口,出任兴州都统制,并踵其父迹,统帅兴州屯驻大军凡二十载,直至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病逝。之所以有此转变,至少应包含以下几点因素。

首先是吴挺身份的转变。孝宗对吴挺本无恶感。乾道三年,吴挺入朝奏事,孝宗曾与其恳谈“至漏下十余刻”<sup>[1]16072</sup>。只是在“抑制吴氏世将”的政策导向下,势须在吴玠死后将其所定接班人与蜀口剥离开来。吴挺入朝不久,适逢宰相虞允文请置一支“不隶三衙,一以属御前”的亲卫军,孝宗有意以吴挺为都统制。面对这一拉近与君主关系的机会,吴挺却力陈“不当轻变祖宗军制”,反对设立皇帝私军,最终使孝宗收回成命。在该事件中,吴挺展现出清醒的政治头脑与刚直不阿的形象,赢得了孝宗的赏识,随即获拜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成为三衙管军。任职步帅期间,吴挺“持身甚廉,治军有律,凡所统驭,宿弊顿除”<sup>[2]</sup>。不仅如此,他还在孝宗燕见时奏论两淮防务,指出两淮形势旷漫,备多则兵分,建议朝廷只在紧要处“修城池,储糗粮……以重兵据之”<sup>[1]16072</sup>,再次得到“嘉纳”。孝宗对吴挺抱有很高的期许,称“挺是朕千百人中选者”<sup>[3]11423</sup>。由于在政治、治军、边谋诸层面均有卓异表现,短短两三年间,吴挺便由备受猜忌的

地方武将成为孝宗极为赏识的爱将。

其次与孝宗践履恢复的战略规划有关。作为南宋少有的恢复之主,乾道后期至淳熙前期是孝宗恢复欲望最为强烈的时期,宋方在三大战区皆有备战部署。乾道七年(1171年)三月,孝宗先是令宿将李显忠率马军司北屯建康(今江苏南京);随后以刘珙为荆襄宣抚使,同时着手将荆南屯驻大军移屯京湖边镇襄阳(今湖北襄阳);乾道八年(1172年)冬,遣步帅吴挺出掌鄂州都统司;翌年八月,合鄂州、荆南二军为一,由吴挺担任荆鄂都统制,统掌京湖七万大军<sup>⑧</sup>。四川战场,为“抚西师为入关之计”,恢复派旗帜性人物、宰相虞允文于乾道八年九月受命出任四川宣抚使。史载孝宗“谕以决策亲征”<sup>[3]654</sup>,筹划与虞允文东西并举,会师河南。其后,孝宗“屡趣师期”<sup>⑨</sup>,虞允文却以“军需未备”为由迟迟不肯出兵,他本人也于淳熙元年初卒于兴元(今陕西汉中)<sup>⑩</sup>。虞允文的不配合与病故,使孝宗的北伐宏愿遭受挫折,转而调整“抑制吴氏世将”政策,并选中吴挺作为恢复事业在四川的执行者。

最后之所以任用吴挺,除了吴氏一族在川蜀享有崇高威望、利于凝聚战力外,吴挺擅打进攻战的特点也是重要原因。南宋武力不振,优秀将才尤其是“进攻型将领”十分匮乏。在绍兴末年的宋金战事中,吴挺先是率军攻克坚城治平寨与巩州(今甘肃陇西),继而连败金军于德顺军(今宁夏隆德)、瓦亭寨,“一月而三捷”<sup>[1]16071</sup>,成为高孝之际四川战区乃至整个南宋军界涌现出的为数不多的“将星”。孝宗若欲北伐,正值盛年、擅打进攻战、又熟悉川陕的吴挺实为不二人选。

为此,淳熙元年春,刚刚出任荆鄂都统使的吴挺再调兴州都统制,正式回归蜀口。

吴挺甫归四川,孝宗即晋升其为定江军节度使,以增崇身份。对于吴挺的要求,孝宗大都予以满足,甚至主动“加码”。如到任兴州伊始,吴挺向朝廷提出犒赏军队,以提升威信。三省初拟犒赏费用十万贯,孝宗认为“支散诸军太少”,追加至二十万贯<sup>⑪</sup>。再如,南宋马匹奇缺,蜀口大军的战马由四川茶马司统一调拨分配。其中,兴州都统司岁额六百零五匹。淳熙二年

(1175年),吴挺奏请绕过茶马司自行于皂郊等地购马五百匹。孝宗再度应允,并主动为其增至七百匹<sup>⑩</sup>。对此,四川茶马李夔极力反对,条上七害,反复申诉,但孝宗不予理睬<sup>⑪</sup>。

孝宗朝前期,四川实行宣抚司体制。虞允文死后,孝宗在任用吴挺为兴州都统制的同时,先后任命郑闻、沈复为四川宣抚使。为表对吴挺的支持,孝宗不惜削夺宣司职权,让渡给吴挺。如关外诸州的场务作为南宋初年蜀口大军的重要利源,本来早已收归宣司,但孝宗以为“财赋聚于宣司而不及军中”,不利于发挥军队主观能动性,下令“取旧属军中场务悉以还”都统司,“宣司不得复取”。再如,兴州屯驻大军各级将领的人事任免权原由宣司掌控。吴挺到任后,孝宗以“军中差使制于宣司而不由都统,则升黜不审,主帅无素恩”为由,诏令除统制官差除由宣司审察外,其余统领官以下军将“俾都统一面自差,宣司只申密院给付而已”。类似“财赋还军中,差使由都统”的做法,极大增强了吴挺等边将的财权与人事权,也导致四川宣抚使沈复对蜀口大军的威信与掌控力大为削弱<sup>⑫</sup>。

淳熙二年六月,孝宗索性召回沈复,裁撤宣抚司,改设制置司。四川宣抚司一般置司蜀口,总川蜀军、民、财政大权,多年来一直由宰执级别的重臣担任。与之相较,制司的职权则要轻得多。一方面,“财计、茶马不与”,制司对总领、茶马二司没有统辖权;另一方面,四川制置使虽名义上有权“节御前军马”<sup>[4]220</sup>,但因驻节成都,深居内地,对蜀口军务的掌控多有不便。至于孝宗倚重的吴挺,制司更是无力驾驭。因此,四川军政体制调整后,川蜀很快呈现出制司、茶马、总领与兴州都统司“四司角立,不相管摄,亦不相下”<sup>[5]</sup>的局面。宣司废罢后的首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即对吴挺“不关报事宜”<sup>[6]612</sup>提出过抗议。随后甚至还发生了吴挺劾罢四川制置使胡元质事件<sup>⑬</sup>。类似武将奏劾阖帅,并成功将其击倒的案例在南宋一朝实属罕见。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又进一步任命吴挺为利州西路安抚使、兼知兴州,“镇抚军民、弹压盗贼”<sup>[7]4058</sup>,使之如其父吴玠一般,总领蜀口西侧军政大权。

总之,吴挺回归蜀口后的短短三四年间,从建节到被赋予军队人事权与财权、废罢宣抚司,

再到令其兼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孝宗对于吴挺的倚重可谓一时无两。不难想见,若孝宗于淳熙前期开启战端,实施全面北伐,总揽四川军政大权的宣抚使人选极有可能会是吴挺,而非制置使范成大等人。正因如此,吴挺不时与文臣所担任的制置使、总领发生冲突,并在冲突过程中得到君主更多的偏袒与支持,进而引发朝臣极大的忧虑与不满,在后者笔下呈现为跋扈难制之状。

既然吴挺归蜀掌兵是孝宗恢复战略下的重要军政人事布局,那么,针对四川边备,南宋方面都有哪些具体措置?抑或说,蜀口边防军政在吴挺归蜀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二、兴州屯驻大军的建制与驻防调整

“绍兴和议”后数年间,南宋四川战区的边防正规军——行营右护军被改组为兴州、兴元与金州三支御前屯驻大军。其中,吴玠掌领的兴州屯驻大军继承其兄吴玠原右护军的大部兵马,兵力达五六万之众,实力最为强劲,而兴元、金州二军总兵力不足四万<sup>⑭</sup>。故此,四川军政长期呈现为“三大将之兵,惟兴州偏重”<sup>[4]320</sup>的格局。

尽管吴玠治军严整,“西路(按即兴州)兵为天下最”<sup>[8]</sup>,仍不免积弊。除贪腐、私役、虚额等当时军队普遍存在的痼疾外,兴州屯驻大军还面临编制与屯驻两大问题。

就军队编制而言,兴州屯驻大军下辖各军级单位的兵力多寡不均。南宋各屯驻大军普遍实行军、将二级编制。兴州都统司下辖前、后、左、右、中、选锋六军,共四十七将,“额管马步军六万人”。其中,中军“管马步二万余人”,兵力占全军总数的将近一半,“诸军皆所不及”<sup>⑮</sup>。在此格局下,中军统制一职自是极为关键。绍兴后期,兴州都统司中军统制由吴玠之侄吴拱担任,吴玠对其十分倚信,“出则使之统率,居则赞其谋议”<sup>[9]</sup>;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吴拱被调往京湖战区供职,中军统制之职由吴玠次子吴玠接替<sup>⑯</sup>;翌年,吴玠亡于陇西军前,吴玠三子吴玠继掌中军,并一度出任中军都统制,直至乾道三年吴玠去世<sup>⑰</sup>。显然,由吴氏子弟把持中军统

制之职乃是吴璘掌控兴州屯驻大军的重要途径,并且吴挺还扮演着兴州大军“储帅”的角色。

就军队驻防而言,兵将散漫,地势回远。由于四川特殊的地理形势,蜀口驻军的军粮补给困难重重,兴州屯驻大军被迫就粮于四川地区“十一州军,并管下县、镇等一十六处”,具体分布在嘉陵江、白龙江、涪江等沿岸二十七处屯驻。部队原有编制被打乱拆散,兵将“漫不相属”。各州、县混合驻扎着前、后、左、中、右、选锋等不同军级建制以下的将、队单位,类似北宋禁军的“插花式”<sup>②</sup>分布。不仅如此,很多部队屯驻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剑州(今四川剑阁)、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内地,却有定期出关外四州(即凤、成、西和、阶州)的任务,“周回二千余里”,疲于奔命。以《高英墓志》所载绍兴中期兴州大军前部统领高英的驻屯情况为例,“公分屯益昌,移苍溪,又移剑山,又移左绵。先自龙阳屯武阶,又屯天水、屯河池、屯同谷、屯大安,凡十驻军”<sup>[10]222</sup>,显见蜀口大军的更戍极为频繁<sup>③</sup>。军队统帅、统兵官与兵士驻地、出戍地之间也因距离遥远,“每有行移,往返迂回,经数千里,不下累月,方得应报”<sup>[7]8717</sup>,造成战区间军令传递、沟通的严重迟滞。

吴璘去世后的乾道中叶,虞允文主持四川军政,曾着力整治军中贪腐,检核军籍,裁汰老癯,破除吴氏子弟把持兴州中军统制的局面,然对军队建制与驻防问题未及处置。乾道末,虞氏再镇川蜀,时任兴州都统制秦琪将“边头六军兵将散漫,地势回远”之弊申报宣司,虞氏因之奏请“随地易置左、右、前、后、中军之部分,以便缓急”,提出将散处各地的兵士依据驻地重新编排,试图建立起军、地间的固定对应关系。不过,虞氏旋即病逝,改革未及实施。杨万里为其撰神道碑,称“于是军势首尾相应”<sup>[11]</sup>,应系夸饰之辞。

如前所述,吴挺归蜀的目的是整军备战,但“武兴所部就饷诸郡,漫不相属”的驻屯格局显然极不利于兴州屯驻大军的日常训练、拣选裁汰、军令传递与集结调度。为此,淳熙四年(1177年),循着虞允文的改制思路,吴挺奏乞将兴州大军“所管军将,就近拨并军次称呼”<sup>[7]8717</sup>,即将散处各地的军队就近合并重组,以便能在日后可能发生的战事中迅速调集队伍,形成合

力,开展攻守作战。

不过,站在孝宗的立场,兴州大军的屯驻问题固然是需要理顺的重点,中军一家独大的隐忧同样亟待解决。为此,朝廷巧妙地将兴州屯驻大军的编制与屯驻问题捆绑处理。具体做法有二。

第一,将前、后、左、右、中、选锋六军的建制扩编为前、后、左、右、中、踏白、摧锋、选锋、策选锋、游奕十军,每军兵额统一定为六千人,由此改变了诸军兵力多寡不均且中军一家独大的局面,在制度层面彻底杜绝了吴挺循父故技,以吴氏子弟任中军统制从而掌控兴州屯驻大军的可能。自此,中军在兴州屯驻大军的地位一落千丈。

第二,在整编军队的基础上,对此前混乱不堪的军、地关系加以整顿,将军队与驻地对应关系固定化,不再实行跨区域长距离更戍。具体规定:踏白、摧锋、选锋、策选锋、游奕五军驻守关外凤、成、西和、阶州沿边要地,左、右、后三军则驻兵“武兴以西至绵”<sup>[3]11423</sup>,前、中两军留屯兴州本司,依据极边、次边、内里,将兴州大军的驻防分为三个圈层。

所谓“武兴以西至绵”,主要是指蜀口与成都平原过渡地带的利、剑、绵诸州。这在史籍记载与考古遗迹中均有佐证。如《舆地纪胜》谓“淳熙中,移兴州左、右军于利州,其隶于兴州自若也”<sup>[12]</sup>,即指此次驻屯调整。开禧三年(1207年),吴曦命心腹褚青为兴州左、右军统制,赴利州益昌接管军队,“夺总领所仓库”<sup>[3]13813</sup>,正是基于左、右二军驻扎利州的现实。1955年,绵阳开元场出土一枚南宋铁权,上有“兴州驻扎御前后军统制司”的铭文<sup>④</sup>,成为兴州后军驻屯绵州的有力证据。淳熙七年(1180年),川南地区发生蛮乱,时任四川制置使胡元质即调遣“绵州驻扎御前后军”<sup>[4]856</sup>、“剑州屯驻后军一千人、昭化左军七百人”<sup>[4]857</sup>前往平叛。

蜀口关外诸州依旧是兴州都统司的屯防重点。凤、成、西和、阶四州驻军达三万之众。并且,由于直面金兵,驻守关外四州的踏白、摧锋、选锋、策选锋、游奕五军,其战斗力明显要强于第二、三圈层的左、右、后、前、中军。李心传即指出淳熙改制后,“摧锋、踏白二军”成为兴州屯驻大军中“最劲者也”<sup>[4]810</sup>。开禧年间,兴州都统

制吴曦发动叛变,摧锋军统制禄禧附逆,踏白军统制王喜的向背成为影响蜀口正反两方力量对比及兴州屯驻大军稳定与否的关键<sup>③</sup>。最终,王喜倒向安丙,这也成为吴曦叛变得以迅速平定的重要原因。变乱平息后,升任兴州都统制的王喜命亲信刘昌国统帅踏白军,而在平乱过程中随安丙立下大功的原中军副将李好义则掌控摧锋军<sup>④</sup>,由此形成两股势力分庭抗礼的局面,其制度逻辑正源于淳熙四年的改制。

淳熙四年兴州屯驻大军的改制是有关南宋四川边防主力军与蜀口防御体系的重要事件,但以往学界不太重视。史载,经此调整,兴州屯驻大军“营部于是始井井然”<sup>[3]11423</sup>。兵将散漫之弊得以有效解决的同时,朝廷也翦除了此前吴氏掌控兴州屯驻大军的重要抓手。新的驻防格局一直行用至理宗朝蜀口防御体系的崩溃。端平年间,吴昌裔奏称绍定四年(1231年)之后,蜀口大军“战溃尤多”。其中“东军”,即兴元、金州两支屯驻大军“最弱,最先溃”,“摧、踏最劲,继亦溃;背嵬、选锋,最守纪律,又口溃”<sup>[13]1360</sup>。可见晚宋时期,原兴州屯驻大军之摧锋、踏白、选锋诸军的战力仍是蜀口诸军中最为强劲的。

### 三、凤州防务归属权的变更

作为南宋蜀口“关外四州”之一,凤州(今陕

西凤州)北以大散关为界,与金凤翔府接境;西南以仙人关、白水关为界,与兴州毗邻;东南以武休关为界,与兴元府相连。《方輿胜览》称“大散扼其东,武休障其西”,“北限秦岭,西通渔梁”,“隐然为蜀门之重”<sup>[14]</sup>。

军事地理上的“门户”与“衢地”位置决定了凤州在南宋四川战区蜀口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从宋金、宋蒙战争史来看,北军以大兵团进攻四川,有三条最主要的路线:由洮州(今甘肃临潭)南下的洮岷宕阶道、由秦州(今甘肃天水)南下的祁山道与由凤翔(今陕西凤翔)南下的陈仓道(又称故道、嘉陵道)。南宋初年,兀朮率金军主力两度大规模进攻蜀口,皆由陈仓道南下,一败于和尚原,再败于仙人关。晚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将阔端率军自大散关由陈仓道入蜀,在凤州兵分两路,东路由武休关攻兴元,西路由仙人关攻沔州。翌年,阔端再次由陈仓南下,并在凤州兵分两路,东路攻兴元府,西路攻沔州,最终完全占领蜀口<sup>⑤</sup>。凤州北境的和尚原、大散关、兴赵原、黄牛堡正扼守着陈仓道入蜀的北口。绍兴和议后,和尚原归于金。大散关、黄牛堡与成州北部的皂郊堡成为南宋蜀口防御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凤州南境的仙人、武休二关则分别控扼着北军由祁山道、陈仓道、连云栈入褒斜道进攻兴州、兴元两大蜀口军政中心的咽喉(见图1),与阶州七方关并称为“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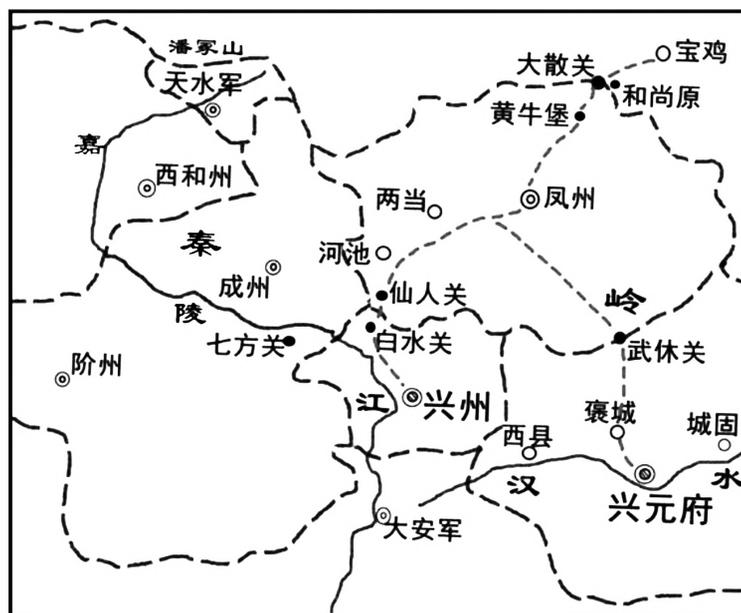


图1 陈仓道与连云栈—褒斜道示意图<sup>⑥</sup>

三关”。此外,战略要地杀金平、四川宣抚使驻地之一的河池等皆位于凤州境内。

正因如此,南宋四川或蜀口军政长官素来重视凤州守臣的遴选。早在南宋初年吴玠守蜀时,凤州防务即长期由其心腹爱将杨政负责<sup>②</sup>。绍兴和议后,右护军左部统制杨从仪久任凤州守臣<sup>③</sup>。绍兴十七年(1147年),右护军改编为御前诸军,杨从仪转任利州西路(即兴州)驻扎御前左部统制,“以本部兵屯仙人原”,受都统制、兼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吴玠节制。

自绍兴中叶四川战区兴州、兴元、金州三大都统司确立,关外四州的防务便一直由兴州都统司负责。其独立控制着金军从洮州、秦州、凤翔南下四川的三条最重要的行军通道,“边面阔远”<sup>[7]3833</sup>,边防压力极大。这也是南宋前中期兴州屯驻大军兵力独重的关键原因。相较而言,兵力将近三万人的兴元都统司<sup>④</sup>,其防区却几无沿边要地。这样的防区划分格局显然不甚合理。

随着吴玠归蜀掌领兴州都统司,南宋中央对凤州防务作出调整。淳熙二年,朝廷宣布“凤州属兴元(都统司)管认”,即凤州防务改由兴元都统司负责。如淳熙末,兴元都统制彭杲在奏疏中称:“臣所管关隘,自洋至凤,向北一带诸谷,多有小路通彼界上。惟大散关是出师正路,宜以重兵守之。”<sup>[15]</sup>显示凤州、大散关皆已纳入兴元都统司防区。朝廷命彭杲在本司“统制官内精选清廉谙练边防民政之人”<sup>[7]9259</sup>,奏举凤州守臣。此后,兴元都统司右军统制郭谓兼知凤州长达六年<sup>⑤</sup>。晚宋时期,李鸣复在描述宋蒙战争前夕蜀口防区划分时亦曾明确指出:“武休之外,曰凤集,兴元戎司主之。”<sup>[13]1354</sup>所谓“凤集”,即凤州也。由此观之,淳熙二年后直至南宋后期,凤州防务的承担主体乃由兴州都统司转移至兴元都统司。

不过,兴州都统司并未完全退出凤州防务。就在宋廷将凤州防务划归兴元都统司的当年秋,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乞下兴州都统司,如凤州不测缓急,所有应援一节,一面应机将附近军马遣发前去,却申制置司照会施行”<sup>[7]9259</sup>,显示凤州防务乃由兴元、兴州两大都统司协同负责。

兴元、兴州二司具体如何协同凤州防务?检诸南宋中后期蜀口战事进程可以发现,凤州北部陈仓道沿线的大散关、黄牛堡、兴赵原防务由兴元都统司独立承担,兴州都统司不再介入。如开禧二年(1206年)末,金军南下蜀口,兴元都统制毋思亲率“重兵守大散关”<sup>[3]13812</sup>。嘉定十一年(1218年)四月,陕西金军向南拓地,攻克大散关,进犯黄牛堡,为兴元都统制吴政所拒<sup>⑥</sup>;翌年春,金军再度进攻黄牛堡,吴政战死<sup>⑦</sup>;宝庆二年(1226年)春,因兴元都统制李大亨“调发失宜”<sup>⑧</sup>,驻守兴赵原的宋军发生叛变。同时,凤州东南至武休关一线防务也由兴元都统司负责。嘉定十二年(1219年)、宝庆二年、绍定四年、端平三年的蜀口战事中,兴元都统制李贵<sup>⑨</sup>、李大亨<sup>⑩</sup>、潘福<sup>⑪</sup>、李显忠<sup>⑫</sup>皆镇守武休关。但兴州都统司仍参与凤州防务,唯集中于凤州西南陈仓道沿线经河池至仙人关一线。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开禧战事中,兴州都统制吴曦“进屯河池”<sup>⑬</sup>;嘉定十一年二月,沔州(即兴州)都统制王大才以“马蹶死于河池”<sup>⑭</sup>;宝庆二年,沔州都统制程信驻守仙人关,皆显示这一防务状况。

由此可见,淳熙以后,以凤州州城为界,大散关至凤州的陈仓道前半段与凤州至武休关的连云栈—褒斜道成为兴元都统司防区;凤州经河池至仙人关的陈仓道后半段作为兴州门户,仍由兴州都统司负责。这样的防区划分颇符合南宋边防守御机制中的“地势皆顺”原则,即每支军队重点布防在一到两条重要交通线上,分路防守。

淳熙初年对凤州防务归属的调整,一方面使兴州都统司得以集中兵力守卫蜀口西线的祁山道与洮岷宕阶道,有助于提升蜀口防御体系的效能,兴州、兴元两大都统司的兵力与防区对应更显合理化;另一方面,陈仓道前半段划入兴元都统司防区,意味着兴州都统司所辖防区一定程度上被压缩,实际可视作朝廷对兴州都统司职权的变相剥夺,可谓一举两得的高明操作。

分区防守对各都统司间的军事协作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宁宗开禧朝吴曦变乱后,南宋中央进一步在蜀口实施分割策略,将兴州都统司一分为二,新成立的利州副都统司

负责阶州与西和州防务,沔州都统司则负责守卫成州与天水军。原本兴州都统司独立承担关外四州防务的格局彻底转变为沔州、利州副、兴元三大都统司分区防守。在晚宋蜀口缺乏强有力权力核心的局面下,各都统司在防守时相互推诿的问题日渐凸显,成为晚宋蜀口防御体系的一大弊病。如嘉定十一年,金军由祁山道南下蜀口,天水、皂郊被兵,但利州副都统制刘昌祖认为这些地区乃是沔州都统制王大才“地分,非己责也”<sup>⑩</sup>,不肯出兵施救,即是典型案例。

#### 四、关外四州守臣的文官化

南宋四川北部的岷州(后改称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凤州、成州(今甘肃成县)与阶州(今甘肃武都),在北宋时属陕西路。南宋初年,陕西六路尽失,唯此四州尚存,时称“关外四州”。由于关外四州在地理上属宋金对峙前沿的极边地带,边防属性突出,南宋在该地区长期实行武将知州的机制。宋人因有“蜀中劲兵,(利州)西路为最,州城守帅,多任武臣”<sup>[16]</sup>的说法。《宋会要辑稿》更明确记载乾道六年,四川宣抚司奏:“关外阶、成、西和、凤州知州,从来宣抚使司于统兵官内踏逐奏差。”<sup>[7]4718</sup> 淳熙元年十月,诏“西和、阶、成、凤州守臣依旧以统制官兼”<sup>[7]4287</sup>。

事实上,早在南宋初年张浚经营川陕时,关外四州即已形成武将知州的传统。如绍兴初年,张浚以便宜命同统领秦凤军马李师颜知成州<sup>⑪</sup>、陕西都统司同统制杨政知凤州<sup>⑫</sup>。绍兴和议后,四川延续武将知州的机制,由右护军统制王彦、姚仲、程俊、杨从仪分知成、阶、西和、凤州<sup>⑬</sup>,并采取类似宋太祖时武将久任知边的模式。以绍兴中后期至乾道年间的阶州守臣为例:绍兴和议后,右护军左部统制姚仲继知阶州达十年;至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姚仲移金州,兴州前部统制王彦继知阶州凡六年<sup>⑭</sup>;此后,兴州左军同统制高英继任,至绍兴三十年(1160年)卒于任上<sup>⑮</sup>。孝宗即位初,由吴玠之子吴拱知阶州<sup>⑯</sup>。虞允文出任四川宣抚使,移吴拱为兴元都统,而以兴州中军同统制、游奕军同统制王中正知阶州<sup>⑰</sup>。乾道六年,时任宣抚使王炎又令王中正与武德郎、知成州梁柄对调,改由梁柄知阶州。淳熙二

年,兴元府右军同统制田世雄知阶州<sup>⑱</sup>。

同时期,南宋北境其他重要边州如楚州(今江苏淮安)、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襄阳的守臣,在战时或以武将为主;但在非战状态下,基本皆是文臣知州或文武通差<sup>⑲</sup>。因此,武将知边可视为南宋前期蜀口防御体系的一项重要表征。

随着吴挺归蜀出任兴州都统制,朝廷于淳熙二年六月废罢四川宣抚司,四川军政重归制置司体制。据《黄氏日钞》所引,当年秋,新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以阶、成、西和、凤四州关外为北界首”为由,“乞从诸司共选辟守臣”<sup>[6]611</sup>。《宋史全文》载有据此形成的诏书:

(淳熙二年)九月庚子,诏:“阶、成、西和、凤州当职官以下,令本路帅、漕司于四路在部官同共选辟,并体量见任人委实瘵老及不堪倚仗者,并申制置司躬亲审量保明,申取朝廷指挥。……”以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所奏也。<sup>[17]</sup>

依照由范成大奏请所形成的新制,关外四州守臣人选由此前的“统兵官”变为“四路在部官”,即由蜀口大军中的武将扩大为四川在部文武官员;同时,四州守臣选举的话语权也转移到利州路安抚、转运司长官手中。由于此前关外四州守臣例行由兴州屯驻大军的统制官、统领官兼任,因此,淳熙二年的新制,显然旨在降低吴挺与兴州都统司在关外四州人事上的影响力。

该建议的提出与稍早前孝宗将兴州屯驻大军中统领官以下的人事任命权重重新下放给吴挺有关。若兴州屯驻大军的军队人事权、财权与关外四州人事权全部集于吴挺之手,而四川制置使又无法对吴挺形成有效制约,这在制度上将是非常危险的。范成大的意见得到朝廷批准原因正在此。军队人事的“先放权”与关外四州人事的“再收权”,深刻反映出孝宗力求在倚仗与防范吴氏武将之间寻求平衡。

淳熙以后关外四州守臣情况,我们仍以石刻材料丰富的阶州为例。如上所述,淳熙二年的阶州守臣是武将田世雄。据淳熙五年所立《阶州新建威显亩家庆楼碑》题名“朝奉大夫、知阶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沿边都巡检使、借紫眉山史祁”<sup>[10]256</sup>,显见当时的阶州守臣史祁已是文臣。位于武都万象洞的题记曰:“郡

太守万钟以淳熙庚子(即淳熙七年)仲春之晦日率同僚来游万象洞天。”<sup>[10]257</sup>考范成大《送同年万元亨知阶州》诗,可知淳熙七年的知阶州万钟(字元亨)乃是范成大同榜进士。范成大赋诗送万钟知阶州,事在淳熙五年,时范成大奉祠居吴<sup>⑤</sup>,又诗中有“又见西游第二人”“临遣中和二千石”<sup>[18]</sup>句,则万钟当是朝廷所命、由东南远赴西北任职。据淳熙十年(1183年)所立《祥渊庙碑》,万钟之后的阶州守臣又是武将田世雄,而田氏之后的阶州守臣,据碑文落款“朝请郎、直秘阁、权知阶州军州、兼管内劝农”<sup>[10]263</sup>,显见是一位文臣,唯姓名不可考。淳熙十三年(1186年)至淳熙十五年(1188年)的阶州守臣是武将郭諲<sup>⑤</sup>。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廷以文臣李师夔知阶州。然师夔“朝辞经月,方出国门”<sup>[7]4997</sup>,未及上任便遭劾放罢。据万象洞题诗,“绍熙改元三月十日……阆中毋丘恪厚卿。……太守毋丘公”<sup>[10]274</sup>,考《宋诗纪事》有毋丘恪《次袁尚书巫山十二峰二十五韵》<sup>⑥</sup>,可知绍熙初的阶州知州毋丘恪亦是文臣。

通过对淳熙、绍熙年间阶州守臣文武身份的考察可知,吴挺归蜀后,文臣知阶州的案例显著增多,仅就淳熙五年至绍熙元年(1190年)这十余年间的大致情形来看,文官化倾向十分明显。并且,就万钟、李师夔的个案而言,至少部分阶州守臣已非本路帅、漕或四川制置使所举四川在地官员,而是来自东南、由中央直接委派,因见朝廷对关外四州守臣任命的介入。西和州的情况大致相同,目前所见淳熙五年后的守臣王杰<sup>③</sup>、杨纬<sup>④</sup>、洪楸<sup>⑤</sup>、喻文然<sup>⑥</sup>、王愬<sup>⑦</sup>皆为文臣,篇幅所限,不再详述。

通常来说,御边与治民是边臣的两项主要职责。文臣知边固然可以提升治民之功效,降低武将拥兵自重之风险,但其不谙军事的职业属性也会为御边事务带来隐患。不仅如此,在南宋军政体制下,作为国防中坚的屯驻大军系所谓御前军,地方上不论是作为帅臣的路级长官安抚使,抑或作为州级长官的知州,都无权调动或指挥这些军队。屯驻大军在制度上只受都统制、统制官等军将或制置、宣抚使等大帅节制。在淳熙初年所形成的文臣知边体制下,蜀口关外四州守臣无权调动本州所驻边防军。淳

熙十五年,兴元都统制彭杲奏称:凤州防务由兴州、兴元两大都统司差拨官兵守把,但凤州知州“见系文臣”,“与屯守之兵各无统临”,不具备屯驻大军的节制指挥权。若遇金军南下,极易发生军事上的相互推诿,贻误战机,请求仍由都统司奏辟武将出任知州<sup>⑧</sup>。嘉定十年(1217年),知天水军、文臣黄炎孙也向朝廷陈诉自己与辖区“出戍官兵”“全无关涉”,“恐缓急误事”<sup>[7]4296</sup>的问题,可谓直指边防要害。

开禧以后,南宋蜀口战事渐趋频仍。特别是嘉定十年至端平三年最终失守的二十年间,蜀口可谓无岁不战。然而,战争的常态化并未使得关外四州迅速回归南宋前期武将知边的机制。检诸史籍,不论是嘉定十一年西和知州杨克家<sup>⑨</sup>、成州知州罗仲甲<sup>⑩</sup>、凤州知州赵希昔<sup>⑪</sup>,嘉定十七年(1224年)的西和知州尚震午<sup>⑫</sup>,抑或绍定四年的凤州知州李寔<sup>⑬</sup>、西和知州陈寅<sup>⑭</sup>、同庆知府李冲<sup>⑮</sup>,端平三年的西和知州陈瑀<sup>⑯</sup>,皆系文臣。关外四州守臣虽负有守土之责,却大多无权指挥当地边防驻军,加上不谙兵事,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蜀口防御体系的迟钝,以致无法应对金、蒙大军的迅猛攻势。这是南宋后期蜀口防御体系效能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理宗朝以后,随着蜀口局势持续恶化,武臣知州再度出现于关外四州,但为时已晚,蜀口丧失的大局无法扭转。

## 结 语

孝宗淳熙元年,吴氏家族第二代领军人物吴挺回归蜀口,掌领四川边防主力军——兴州屯驻大军。此后数年间,南宋针对蜀口防务集中进行了一系列调整。除了以往学界关注较多的裁撤四川宣抚司、改设四川制置司外,至少还有以下三点:第一是兴州屯驻大军的建制与驻防改革。具体来说,将原本六军、每军兵力多寡不一的建制扩编为十军,每军兵额裁定为六千人。其中,踏白、摧锋、选锋、策选锋、游奕五军驻守关外凤、成、西和、阶州沿边要地,前、中两军留屯兴州本司,左、右、后三军则驻兵利、剑、绵诸州,形成军队与驻地间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第二是蜀口边防重镇凤州的防务由此前的

兴州都统司独立承担变为兴元、兴州两大都统司协同负责。具体来说,以凤州州城为界,大散关至凤州的陈仓道前半段与凤州至武休关的连云栈—褒斜道成为兴元都统司防区;凤州经河池至仙人关的陈仓道后半段作为兴州门户,仍由兴州都统司负责。第三是关外四州守臣身份的变化。淳熙以前,成、凤、西和(岷)、阶四州守臣例行由右护军或兴州都统司统制官兼任。淳熙以后,关外四州守臣的文官化倾向明显。

吴挺归蜀掌兵实际是孝宗恢复战略下的重要军政人事布局。然而,吴挺出任兴州都统制后,四川边备的相关措置却并非完全旨在增强边防军事力量。孝宗一方面为吴挺建节、予其军队人事与财权、废罢宣抚司、令兼利州西路安抚使,示以极大的倚信;另一方面,兴州屯驻大军建制改革、凤州防务划归兴元都统司、关外四州守臣的文官化等有关蜀口边备的调整,既有增强蜀口边防效能的考虑,却又或隐或显地体现出防范吴挺与兴州都统司的意味。这些紧密围绕于同一时间节点又自相矛盾的措置,深刻反映出南宋君主对于吴氏世将“既用且防”的复杂心态。

南宋四川战区的蜀口防御体系形成于南宋初年特殊的内外局势下,带有很强的自发性与应激性。这套防御体系的诸多机制,如关外四州——成、凤、西和、阶州以蜀口大军的军级统兵官兼任知州;兴州都统司掌领重兵,独立守备陈仓、祁山与洮岷宕阶道三条入川通道;兴州都统司中军兵力独重等,在南宋朝廷看来固然不尽合理,甚至视作滋生地方分裂的温床,却因应四川地方的实际情况,并很好发挥了保固川蜀、边卫东南的边防战略效能。但当南宋中央按照自身要求或防弊考量将其加以整齐化、合理化改造后,蜀口防御体系再次面对强敌时的功效却大打折扣。

#### 注释

①张邦炜:《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原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收入氏著《恍惚斋两宋史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8—177页。②陈希丰:《近百年南宋川陕军政问题研究述评》,《宋代文化研究》第3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③曹家齐:《中国大陆南宋史研究二十年回

顾》,《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14日。④雷家圣:《南宋四川总领所地位的演变——以总领所与宣抚司、制置司的关系为中心》,《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9年第41期;何玉红:《武将知州与“以文驭武”——以南宋吴氏武将知兴州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王化雨:《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迹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⑤仅杨倩描《吴家将——吴玠吴玠吴挺吴曦合传》一书中有零星涉及,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219—220页。⑥洪遵:《少傅奉国军节度使吴璘授少师制》,载《永乐大典》卷九一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7页。⑦陈希丰:《吴璘病笃与蜀口谋帅:南宋高孝之际四川军政探析》,《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3期。⑧陈希丰:《南宋中期京湖战区的军事格局——以军队指挥及驻防机制为中心》,《传统文化研究》2023年第2期。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27页,第631页,第831页,第821页。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039页,第9095页,第4019页,第5010页,第4056页,第2153页,第8871页,第4719页,第4719页,第5038页,第9259页,第5032页。⑬⑭均见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⑮对吴挺劾罢胡元质事件的分析,详见王化雨:《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迹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⑯⑰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9页,第67页。⑱⑲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4页。类似问题也存在于兴元都统司。兴元屯驻大军下辖五军,中军达一万二千人,与其他四军之和大致相当。淳熙九年,在都统制彭杲任内,兴元大军各军“多寡不同”的问题得到解决。第1349页。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752页,第3771页,第1074页,第2745页,第1036页,第1074页,第3377页。㉑有学者认为“在川陕战区内,军队屯驻地点固定,缺乏更戍与流动机制”,恐须具体时期具体分析。参见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㉒郭平:《绵阳出土铁军权考》,《四川文物》2018年第4期。㉓蔡东洲、胡宁:《安丙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57页;晁芊桦:《安丙冤杀蜀中义士献疑》,《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㉔李天鸣:《宋元战史》,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309—314页。㉕此图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的南宋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东路、利州西路地图所改绘,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㉖马端临:《文

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616页。⑳㉑㉒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70页，第13236页，第13237—13238页。㉓㉔㉕佚名：《续编两朝纲目提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86页，第286页，第285页。㉖㉗均见李曾伯：《可斋杂稿》，载《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399页。㉘㉙㉚㉛蔡副全：《陇南金石题壁萃编》，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23页，第233页，第248页，第270页，第329页。㉜李之亮：《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97—102、548—551页；㉝于北山：《范成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㉞厉鹗辑撰：《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8—1329页。㉟吴泳：《鹤林集》，巴蜀书社2022年版，第120页。㊱㊲均见刘克庄撰，王瑞来集证：《玉牒初草集证》，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94页。㊳㊴佚名：《昭忠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0页，第226页。㊵赵景良编：《忠义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20页。

#### 参考文献

- [1]高文虎.世功保蜀忠德碑[M]//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 [2]孔学.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9:1194.
- [3]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 [5]史浩.史浩集[M].俞信芳,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185.
- [6]黄震.黄氏日抄[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7]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8]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M].顾宏义,苏贤,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320.
- [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3808.
- [10]蔡副全.陇南金石题壁萃编[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11]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M].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4616.
- [12]王象之.舆地纪胜[M].李勇先,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5348.
- [13]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4]祝穆.方輿胜览[M].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1213.
- [15]周必大.周必大集校证[M].王瑞来,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2252.
- [16]吴泳.鹤林集[M].吴洪泽,点校.成都:巴蜀书社,2022:270.
- [17]宋史全文[M].汪圣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2167.
- [18]范成大.范成大集[M].辛更儒,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370.

## Wu Ting's Return to Sichuan and the Adjustment of Sichuan Border Defense in the Middl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en Xifeng

**Abstract:** In 1174, due to the restoration strategy implemented by Emperor Xiaozong, Wu Ting, the second-generation leader of the Wu family, returned to Sichuan and was appointed as the commander of Xingzhou.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made a series of defensive adjustments for Shukou. On the one hand, Emperor Xiaozong granted Wu Ting the title of Jiedushi, abolished the Sichuan Xuanfu Department, granted him personnel and financial power in the army, and appointed him the military commissioner of Lizhou West, demonstrating great trust and “delegation of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ecautionary measures such as appointing officials to oversee the Outer Four Prefectures, reforming Xingzhou army, and transferring Fengzhou defense to the Xingyuan Commander in Chief, which showed a desire to keep Wu Ting on guard. These actions reflect the contradictory mentality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monarch towards generals from Wu clan: a strategy of “utilization while monitoring”. This has impacted the border defense of the Shukou defense system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Southern Song; Wu Ting; Sichuan theater of operation; border defense

[责任编辑/晨 潇]